身体活动与意义形成

张晓虎

(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对身体思维的哲学探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竟话题。从实践意义看,我的身体不仅是我的意志的载体、我的运动机能的寓所、我作用于世界的工具,还伴随着我的全部感知、评价活动。我的全部感受、反应等意向活动都是通过身体发挥作用的。探讨身体哲学,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尤有借鉴价值。它可以与马克思批判德国古典哲学“无人身的理性”、强调实践的直接感性特征相互印证。如同感觉是身体的感觉,意识也是身体的意识。身体在感性实践活动中形成主体际的交往场域。主体交往首先是身体的互动,身体互动构成礼仪。主体际形成特定的礼仪文化模式。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就是培养能够“感同身受”地体会他人、他事的意义沟通能力。礼乐文化强化了意义的社会功能。以人为本的价值观首先表现在对人身体的关怀、尊重上面。

关键词: 身体感性;意义形成;礼与身体场;身体互动

中图分类号: B0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5X(2015)01-0090-06

意义是人类在改造世界过程中与对象发生的价值关系。意义意味着外部世界融入主体的活动领域,世界由于主体活动而具有了特定意义,成为意义的世界。主体活动外无意义世界可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理性为自然立法”所体现的思想合理性也在此。马克思早年提出劳动的直接感性意义,包含了身体哲学的基本内涵。而胡塞尔提出“回到事物本身”的意向直观思路,最后发展到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这是西方意识哲学到身体哲学的漫长回归。

从身体现象学,我们可以对意义的原始发生进行细微考察。其实,人类有意识、有目标的自觉活动之前,作为生理之身和物质环境之间已经有了漫长的物质、能量交换。这是意义的原始形成阶段。是身体首先在生理层次上通过品尝、移动、嗅闻和环境形成原始生存意义。但只有实践的身体才最终整合了所有这些感性活动,形成对生存至关重要的意义关系。即使是意义的思想阶段也是建立在浓厚的身体感觉语境中,各种思想意识通过符号传达的意义只是放大、凝聚、升华了身体的语境体验而已。

一、在身体场中产生 统摄感性活动的意义

马克思早就关注过身体的哲学原发地位,他曾说过:“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

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105}。马克思强烈批判德国古典哲学“无人身的理性”所带来的虚幻性,认为作为“现实的人”、“感性的活动”,人的本质是作为“劳动的身体”而实现的。对于为生存而劳作、活动的身体,它的观念活动不是纯逻辑和概念的,而是“感性心理学”的。是一种探讨身体活动的感性需要和感性意识。马克思因此高度评价感性和身体的意义,他说:“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可见,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1]89-90}。

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因为当时更紧迫的革命任务,暂时放弃了“感性身体的实践活动”这一课题的探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尘封八十余年才重见天日。但是马克思在《手稿》里开辟的这一理论道路至今仍有不朽的生命力,值得我们深入发扬。今天,在生存论哲学、价值哲学、实践哲学的论域,意义具有基础的地位,而意义的发生必须从身体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才能阐释清楚。

收稿日期:2014-11-04

作者简介:张晓虎,男,哲学博士,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今天我们探索意义的原始形成,除了继承马克思的思想,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也能够提供深刻的学理基础。梅洛·庞蒂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观念汲取了丰富的思想。在胡塞尔那里,生活世界不是由必然普遍的命题表达出来的那种客观性,而是日常生活体验化的意义世界。梅洛·庞蒂创立的身体现象学充分利用了20世纪产生的心理学,尤其是格式塔心理学的成果。格式塔心理学力图消弭身心二分模式、力图回到原初体验的方向对梅洛·庞蒂产生了深刻影响。他通过心理学把日常生活的认识过程微观化了,而这些微观过程都围绕身体的感受意义展开。

与当前国内学术界把认知与评价作为认识论的统一过程不同,在主客体关系中,梅洛·庞蒂并不特别看重意识,他认为:“是感知的身体生产着并组织着意义的最初进程。以现在时为着落点,我们经历着对现实与真实、对‘在场’的体验”^{[2]4}。认识的知觉能力不是意识活动而是对环境的身体感受。梅洛·庞蒂认为身体的知觉开始是不用意识的,儿童从出生到学步,就是充分利用肌肉、运动神经、平衡能力对需求对象的整体把握。“我的身体,作为我把握世界的系统,建立着我所知觉的物体的统一性”^{[2]16}。一旦儿童的身体对环境形成完整的知觉,会形成类似于初级思维的“身体图式”,用以处理各种生存信息。

梅洛·庞蒂说:“身体图式一定是在童年时期,随着触觉、运动觉的关节觉内容相互联合,或与视觉内容联合从而能越来越容易地唤起视觉内容,逐渐形成的。”^{[3]136}身体图式具有先天的生存动力根据,在和外界接触、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不断变化、丰富和发展起来。

有了身体图式的意义指向,才能理解为什么感官不止于视、听、触、味、嗅自身,而是力图上下左右串联、产生“通感”、“联觉”。原始意义正是在通感、联觉中产生的。意义使生理的需求不限于口腹之欲,而是成为整个身体的兴奋。如食物不仅是口腹的对象而是成为整个感性身体的欣赏对象。是身体促进了通感、联觉的形成。外物是立体的存在,在活动中身体形成了一个“场”,正如电磁场中的电磁转换。身体场中,感觉转化为三维感知的知觉。融合在身体场中的知觉具有通感和感性全息的特点。梅洛·庞蒂描述了在联觉和通感中意义的三维感性:“从鸟儿飞离引起的树枝摇动中,我们得知树枝的柔韧或弹性,……我们看到深深陷入沙中的铸铁的重量,水的流动性,糖浆的粘性。同样,我从

一辆汽车的声音中听到了路面的硬度和不平整,我们有理由谈论‘柔软的’、‘苍白的’、‘生硬的’声音。”^{[3]294}事物的意义不在单纯的主体或客体某一方,而在身体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最初的意义就表现为我们用以体验生命的、活泼的原初感受。

在心理学上,知觉是形成具有意义的感性单位,片面的感觉不可能满足生命需求。正如单纯的圆、红、脆、甜感觉均不能构成意义,只有知觉为“枣、桃、苹果”等三维立体感受才能满足需求欲望、得以形成实体感,由此才具有“美味”的意义属性。通过记忆保存的表象才可能引发通感、联觉。因此,知觉是意义感的起源。在我们以往谈论感性认识时,只是泛泛论及视觉、嗅觉、听觉、触觉是感性认识,是对事物表面现象和外部联系的生动的直观。但对不同的感觉如何组织为知觉整体则语焉不详,对意义的最初形成更是从未论及。知觉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是认识的初级阶段,更是意义的形成。美国心理学家克拉威克认为:“知觉的最后产物——意义并不是从刺激得来,而主要是观测者给予它的。事物因此并不是它们看来的样子。我们关于世界及世人的知觉是由态度的、情绪的、动机的和评价的因素决定的。”^{[4]96}知觉感受体验和事物的意义几乎无法分开,如甘甜的美味、春日日和煦、寒风的凛冽,这些意义感受来自身体的不同感知路径,凝结在身体为载体的内在体验之流中,被身体以意义整合为一体。

身体不是封闭在思想或内省的世界里,而是通过感觉和意向表现出来。梅洛·庞蒂指出:“意义产生于感性事物的最初阶段,……意义摹拟这种占优势的体验,在这种体验中,意义准确地涵盖了感性事物,明显地在感性事物中显现出来或表现出来;意义包含了这种知觉规律”^{[3]44}。即是说,我们的所有体验、感受是受意义引导的,没有意义对感性活动的整合作用,所有的活动都会无法完成。梅洛·庞蒂举了一位在战场上被炮弹片损伤了大脑枕叶的病人。这位病人能毫不费力地进行哪些在生活行动上具有某种具体意义的身体运动,但是凡是生活行动上没有意义的抽象身体运动,他却无能为力。

例如,当蚊子叮在这位病人的鼻尖上的时候,他能用手赶走蚊子,鼻子堵塞时能从衣袋里掏出手绢擤鼻涕。但是他却不能按照医生的指示指出鼻子的位置。他能抬起胳膊从衣架上取物,却不能照医生的要求以水平方向抬起胳膊。如果是具有生活感性的意义运动,他都能轻而易举地完成,但是

没有任何当下实际意义的抽象身体运动,那种纯粹的指示行为,他却束手无策。不是客观的“物”,也不是主观的“思”,而是主客观统一的“事”构成我们知觉基础的意义。知觉是身体图式化、主客统一、并被充分意义化了的。

具有动力学特征的身体图式不仅有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而且能通过不假思索的操作身体作出有意义的行为反应。梅洛·庞蒂说:“是身体‘明白’和‘理解’了运动。习惯的获得就是对一种意义的把握,……如果我有驾驶汽车的习惯,我把汽车开到一条路上,我不需要比较路的宽度和车身的宽度就知道‘我能通过’,就像我通过房门时不用比较房门的宽度和我的身体的宽度。”^{[3]189} 私家车大量普及的今天,熟练车手对此已不言而喻,心理学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动力定型”或行为的自动化、熟练化反映,它比作为知觉记忆的表象更深刻地反映了行为的身体特点。而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则更强调不假思索的运动知觉。

梅洛·庞蒂将“知觉”确定为身体图式的焦点,但是知觉在他这里不是作为感性认识的一个阶段,而是格式塔心理学的一个“完形”,具有一种内在的趋整动力。人不是用单纯的视觉、听觉、嗅觉等器官个别地感知外物,而是构成一个整体的组织系统,这就是“身体图式”、“知觉完形”的意义。梅洛·庞蒂说:“身体图式不再是在体验过程中建立的联合的单纯结果,而是在感觉间的世界中对我的身体姿态的整体觉悟,……身体图式根据它们对机体计划的价值主动地把存在着的身体各部分联合在一起。”^{[3]137}

这种具有完形的身体图式,一旦产生意义破缺,就会极大地破坏身体运动的目的性、平衡性。著名运动员桑兰,在一次国际体操比赛中,已经开始起跑了,但隐约看到有人拉动了前方的垫子,使她的身体运动目标突然断裂,致使身体失控而严重摔伤。正如我们在开车、打球、做工等一系列具有多元感性综合的活动时,意义是统领一切感受的中枢。如果在开车过程中,突然去注意换挡手柄的颜色;打字时分心去观察手指的位置,都会使意义受损从而导致运动失败。感性认识决不仅仅是我们哲学教科书所定义的理性认识的准备阶段。更进一步,是身体的感受赋予客体以生命意义,为我们把握世界指明道路,“由此可以得出,感知始终在参照身体”^{[3]81-82}。感性不仅是理性的基础,而且还是意义、价值的来源,它指引着人类认识、实践的方向。

二、在身体活动符号化过程中形成理性思维

意义是现代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它又离不开对词语的解释。在日常用法中,意义往往与词义密切相关。美国哲学家塞尔认为:“就物理特征来看,语言只是一些发出的声音和写在纸上的墨迹,是意识和意向性赋予这些声音和符号以一定的意义。”^{[5]5} 晚期的维特根斯坦认为,对于词的意义研究,应当“不问意义,只问用途”,这就强调了具体语言环境的作用。除了感性,人还通过语词符号来把握世界,怎样将符号融入感性身体构成的语境,才是意义形成的关键点。

符号形成与身体有不解之缘。“符号可以由身体有机地产生,或者可以借助身体在技术上延伸,工具化地产生。”^{[6]139} 当人身临其境地处于某一场景的时候,他的感知能力充分发挥,对环境中的事物端倪、痕迹都会有异乎寻常的敏感。卡西尔说:“对符号思维来说,在现实与可能、实际事物与理想事物之间作出鲜明的区别,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符号并不是作为物理世界一部分的那种现实存在,而是具有一个‘意义’。”^{[7]72} “意义”首先是身体活动的选择。日常生活中许多技艺精湛的工匠往往“日用而不知”对自己的技能操作难以言传。这都是劳动能力表现为身体知觉,大量的人生意义、劳动实践意义主要通过各种身体意向、图形标志、图像符号表示而不一定表现为言语的符号形态,但是符号是思想理论化的必要途径。但符号不能抽象而行,而是沉浸在各种身体语言、表情语气、标志符号构成的“默会”的语境海洋里。

意义是人类需求与对象物间的满足关系。按照马斯洛的需求阶梯理论,随着需求提升,意义有可能从感性领域进入理性和意识的境界。但这不是那种纯粹逻辑意义的理性而是与生活感性融为一体的身心统一活动。

与动物的本能活动不同,人类的劳动在开始时,其结果就已经观念地存在于人的头脑中了。更需要强调的是:人的劳动不仅是合目的而且还是合规律的活动,而这种规律的反映只有理性认识、理性的价值评价才能达到,这里需要意义的跃升。如果没有理性的价值评价只能是生理本能的反应,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践。人类和动物都有建立在适应生存的行为活动模式,但是,除了人具有动物的遗传本能外,人的大多数行为模式是后天形成的、符号化的。

美国哲学家怀特说：“人有两类不同的行为：符号行为与非符号行为。人会打哈欠、伸懒腰；会咳嗽和瘙痒；会疼的大喊大叫，吓得缩成一团，气的毛发倒立等等。这一类非符号行为不是人所专有的行为，不仅灵长类动物都有这种行为，而且其他许多动物也都有这种行为。但除此而外，人还凭借语言与他的伙伴交往，他会使用护身符忏悔他的罪行、制定法律、奉行礼仪规范、解释他的梦境和按照规定的范畴来划分亲属关系等等。由于这类行为包含或依赖于对符号的运用。因而是专属于人的行为。”^{[8]34-35}

与动物有限的身体运动受到先天生理遗传的严格限制不同，人类的实践开辟的身体运动类型几乎是无穷尽的。我们可以学会复杂的车铣刨磨等工艺，我们可以学会开车、做饭、打球等等先天没有的各种运动技巧。是劳动工具使人的行为丰富和复杂化的，劳动工具意味着新的身体运动，而要重复这种身体运动就要以身体示范，所谓榜样就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为，这实质就是形成脱离实物过程的“符号化”。符号化，使操作工具的身体成为人类社会普遍的现象。无论以后人类的实践多么复杂，由身体生发的意义指向，永远统领着文化生活的核心内容。

是符号思维使人类有了自我意识，黑格尔说：“在‘我’里面我们才有完全纯粹的思想出现。动物不能说出一个‘我’字。只有人才敢说‘我’因为只有人才有思维。”^{[9]82}黑格尔更进一步认为，有了自我意识和思维，人才能走出感官世界的混沌。“意识在自我意识里，亦即在精神的概念里，才第一次找到它的转折点，到了这个阶段，它才能从感性的此岸世界之五色缤纷的假象里，并且从超感官的彼岸世界之空洞的黑夜里走出来”^{[10]122}。因此，人类有了主客观二元世界的对立，这既是人类自觉意识的高度发展，又意味着人对日常感性世界的可能背离。无论思维是多么具有超越性的形而上意义，它的起点仍然是身体，正如感觉是身体的感觉一样，意识开始也是身体的意识。身体活动的意义指向也是人的生命意向性的自觉化，各种复杂的智力指向总是直接间接地追随着情感，在情感的驱动之下才会产生各种“非理性”的直觉领悟能力。主体真诚感的态度与认识到达的真实对象性之间具有不可分解的关系。来自于人际互动的“人言”就是“信”，表现为我们对人际交往可能的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支撑，我们不可能任由思维信马由缰地去探索未知世界。真实的思维过程是与身体意义结

合一体的，纯粹意识的哲学只能是思维的乌托邦。

梅洛·庞蒂高扬原始的感知而否定从柏拉图、笛卡尔、而来的贬低感知的西方哲学传统。西方的意识哲学从笛卡尔主体思维的“我思”起，严格划分主客体二元。所以梅洛·庞蒂提出了亦心亦物、非心非物的身体概念作为现象学的核心范畴。不是概念的思维推导，也不是从客体到主体的“刺激—反应”模式，而是格式塔的自组织构成了思想的动力。他说“格式塔是感觉场的自动组织结构，是感觉场使得所谓的‘元素’从属于‘整体’，而该整体又结合到更广泛的整体中去。这一组织结构不是像一个形式那样存在于异质的物质之上。”^{[2]92}但是，这种站在后现代主义立场上消解主体性与客体之间的对立导致了一系列互相矛盾的结果。

这种凭借本能与直觉的身体感性导致了梅洛·庞蒂对有意识的理性行为保持沉默。这引起了理性主义者的批评。如美国当代实用主义哲学家舒斯特曼就批评他过分依赖身体的原始知觉与行为习惯，弱化了本能改造和持续学习。他认为身体知觉不能解释日常生活的学习行为。他说：“（身体知觉）并不能解释我们日常运动和感知、言语和思想的各种动力。跳到水中，我能自发地摆动我的手臂和腿，但是我不能游泳，除非此前我已学会了怎样游泳；听到一首日语歌曲时，我可以自然而然地试着跟着哼唱，但我根本学不会它，除非我此前已经学会了日语中足够的词汇。对于很多事情，我们都会自发地做或理解，但它们已超出了这些未经反思的身体行为的全部范围。”^{[11]94}舒斯特曼因此批评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是“沉默跛脚的身体哲学”。从这种本能直觉状态进入理性世界要从符号入手。

身体的学习必须借助于符号的中介才能进入文化世界，否则是不可能的超出人的原始本能。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命名这种概念化活动对走出混沌的感觉世界有很大的意义。“正是命名过程改变了甚至连动物也都具有的感官印象世界，使之变成了一个心理的世界，一个观念和意义的世界”^{[12]55}。我们不能只是依赖先天的自发的身体知觉，感性的身体必须借助符号化的概念思维，一旦有了符号名称，感性就有了一个从混沌到有序的中心，从此开始了意识对身体的引领关系。

是有目的的劳动实践，才使人类获得了社会存在的方式。马克思指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

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13]272}梅洛·庞蒂通过身体活动虽然可以很好地解释原始的意义发生,但是对高等级的实践意义就显得无能为力了。而离开了有意识的社会实践,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变成了动物与环境的关系。适度保持理性的抽象思维与身体化的感性行为之间的张力,才是既有理性又有活泼的生命感性的实践哲学的目标。

三、在身体互动中产生意义的传播

意义是价值的体现,而价值又是凝聚一个社会团体的核心文化力量。所以一切社会都需要放大、强化提升自己核心价值的手段,意义又面临她的第二个任务——传播。德国哲学家、美学家席勒提出,人三种依次发展的价值“冲动”,其中“感性冲动使人感到自然要求的强迫,而理性冲动又使人感到理性要求的强迫;游戏冲动却要‘消除一切强迫,使人在物质方面(即感性方面)和精神方面(即理性方面)都恢复自由’”^{[14]448}。游戏的人是摆脱了感性和理性片面性的艺术化的人,人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时,才能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而游戏过程中形成的“游戏规则”成为社会习俗、制度规范的原型。借助于游戏中充满感性的身体互动,人类的行为准则、道德取向等核心价值都得到了强化和放大。礼仪是身体互动的复杂模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清作为中国悠久的“礼乐文化”的形成及本质,看清礼乐文化具有的营造身体交往场的功能。

在中国古代,以身体性质来解释礼仪的功能、属性就是在寻找具有同质的身体一致感。以身喻礼,在先秦文献里就已经比比皆是。如“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15]成公13年}左传作者认为爱惜生命、就珍惜身体,才能设身处地地推己及人,将礼的价值与身体的存亡联系起来“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是以有礼。”^{[15]昭公25年}而孔子在《论语·季氏》中也明确指出“不学礼,无以立”。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社会化”即在各种而社会关系中确定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正如马克思所说“人首先是把自己反映在别一个人身上。一个名叫彼得的人所以会把自己当作一个人来看,只是因为他把那一个名叫保罗的人看作自己的同种”^{[16]25}。

微观上,人的社会化首先是身体的社会化。通

过身体的举手投足、语气表情,我们获得与别人感同身受、心心相印”的能力。在身体的互动前提下,社会共同感、集体表象、群体意识才能够形成。在意义、价值观传播过程中,中国人始终强调“言教不如身教”。正因为身教包含了“言教”因其抽象性可能舍弃了的身体互动中形成的意义场。现象学的创立人胡塞尔晚年提出“交互主体性”问题,他从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入手,认为自我意识实际是主体际的产物,他说:“在我之内,在我的先验还原了的纯粹的意识生活领域之内,我所经验到的世界连同他人在内,按照经验的意义,可以说并不是我个人综合的产物,而只是一个外在于我的世界,一个交互主体性的世界,是为每个人在此存在着的世界,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其客观对象的世界。”^{[17]153}而梅洛·庞蒂则把主体理解为身体,因此主体际在他那里就具有身体际的含义。

梅洛·庞蒂认为主体际通过身体际表现出来:“因为我有一个身体和一个自然世界,所以我能在这个世界发现我的行为与之交织在一起的其他人的行为”^{[3]450}。在人与人之间通过感性的互动实际上也形成了一个具有人性色彩的交往场域“我不仅有一个自然界,……我也有道路、农田、村庄、街道、教堂、用具、电铃、羹匙、烟斗。这些物体中的每一个物体都以阴文形式带着有助人类活动的印迹。每一个物体都散发出一种人性的气息”^{[3]438}。

梅洛·庞蒂通过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发现人在原初知觉范围就存在对人际交往的敏锐感知力,社会关系反映在最初的原始感知里面。他说:“我通过我的行为的类比,通过能告诉我被感知动作的意义和意向的我的内心体验来解释他们的行为。总之,其他人的行为始终能通过我的行为而被理解。”^{[3]439}人的这种人际感受力产生了人与人之间可以心心相印、感同身受、设身处地等等同类感受的基础。中国人喜欢感受人际交往中的气氛,强调“气场”无不与悠久的礼乐文化的长期熏陶有密切关系。

这种气场无疑与人类具有一定先天共同感有关,荀子认识到:作为同种的生物,人与人感受有相同处,他指出:“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18]正名}在共同感的基础上,符号化的“相约以名”才能形成。在符号化基础上,人类沟通的复杂礼仪活动本质也是意义的传播。礼乐文化是不舍弃感性的社会化理性认同状态,如此我们可以才理解孔子在行礼时对“名”的坚持。孔子坚持礼

器、名分与礼仪的统一性。“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15]成公2年

与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强调身体直觉的原发性、先天性不同。中国儒学思想家还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尤其是身体力行的学习:“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17]劝学学礼更要强调体之以行;这也是“言教不如身教”的含义。“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18]劝学身体是介入社会生活的主体。通过社会生活的人际互动,他人的身体语言也会向我敞开。人性是在人际交往中形成的,礼仪带来容止合一的身体形态,人与人之间才能预期彼此的用意,倾心交往。

对感性认识、感性交往进行身体现象学的解读,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本人就非常重视感性在哲学中的地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的巴黎手稿里,马克思特别强调了工业化实践与人类感性的历史以及身体作为生产的原型;强调了人的感性交往。这是马克思对主客体二元哲学的一个重要超越。人既是经历数百万年进化的高等生命,又是具有理性智慧的社会动物,二者通过劳动实践融为一体。但是如何从理论上将人的动物性与社会性有机结合却存在一定的理论难度。或者有用生物本能解释人类活动;或者割裂人的生物存在与社会存在,将人解释为不食人间烟火、“无人身”的纯粹道德载体。实际上,生物人与社会人更多的是通过感性活动辩证综合为一体的。马克思说:“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1]感性的身体正因为首先是自然的存在才能参加进自然的运动,然后在长期的生存—劳动过程中脱离纯粹自然,形成主客体的实践关系。自然人与社会人正是在主客体长期相互融合中达到实践的、历史的统一。在这里,除非引入身体范畴就无法克服脱离感性生活的抽象、片面、空洞的理论缺陷。

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兴起的生活哲学、交往实践、主体际等问题涌现,出现了一个与悠久的中国身体哲学、身体思维传统结合的契机。身体哲学本质上是实践感性的主体辩证法问题,也是结合马克思《手稿》对实践观念更加微观、绵密的行为学发展。具有深刻实践经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

不是概念化地空谈“实践”,而是体现了具体、动态、感性的主体化辩证思维方式;毛泽东提出“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邓小平提出的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评判是“鞋子合脚不合脚只有穿鞋子的人才知道”。他比喻最近展开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是“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都是以身为喻,通俗而生动具体,体现了这种动态、整体、重亲身体验的主体辩证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中国实践结合是项长远的理论工程。本文从意义形成的身体背景角度对我国传统礼乐文化进行反思和解读,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方向以人民的感性生活为皈依。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2000.
- [2] [法]梅洛·庞蒂. 知觉的首要地位及其哲学结论[M]. 北京:三联书店,2002.
- [3] [法]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4] [美]克拉威克. 心理学的体系与理论:上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5] [美]约翰·塞尔. 心灵、语言和社会[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 [6] [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 [7] [德]卡西尔. 人论[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 [8] [美]莱斯利·怀特. 文化的科学[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 [9] [德]黑格尔. 小逻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10] [德]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11] [美]舒斯特曼. 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12] [德]卡西尔. 语言与神话[M]. 北京:三联书店,1988.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14] 朱光潜. 西方美学史:下册[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15]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 [16]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17] [德]胡塞尔. 生活世界现象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 [18]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88.